

采访女人

程迺欣 著

众生丛书 ● 新闻眼系列



众生丛书
新闻眼系列

采访女人

●程迺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访女人/程迺欣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3
(众生丛书/曹志前主编)

ISBN7-5059-2428-1

I. 采… II. 程…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656 号

采访女人

程迺欣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顺义板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 插页 195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

ISBN 7-5059-2428-1

I·1782

定价:13.30 元

总 序

《众生》寄语众生

《众生丛书》与读者见面了。

“众生”作为一套丛书的名字，也许并没有多少骇世惊俗的新意，然而，它是作者们用心血奉献给读者的一套纪实丛书。

在《众生》问世的前一年，《众生》的一些作者参与了《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的策划出版。这套丛书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这固然得益于公开刊登广告，最终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支付版税接受出版的这一运作方式的新闻性，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套书涉及的丰富的社会层面和纪实风格的多样化。有海外媒体称这套书勾勒出一幅中国变革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并称这套由记者联手运作的书的问世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虽然此语不免言之过大，但确是就形式与内容二者的新颖而论的。

那么，继《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之后的《众生丛书》，又是一套什么书呢？

严肃的纪实作品，有它的定位原则，然而，作为作者在写作时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读者爱看什么书？

作者除了宣泄自己的写作欲望，以主观来表达对客观生活的观照以外，同时也面对着那只“看不见的手”，面对着市场运作的严酷法则。在商业性图书泛滥的今天，这一点尤其明显。精神产品一进入市场，就成了商品，而商品如果没有消费者，那便是制造者的悲哀了。

FNE 32

研究读者的阅读口味，不是如某些理论家所说媚俗或媚雅，而是要找到广大图书消费者的阅读关注点。这些关注点往往是社会转型期新事物的生长点和旧事物的消亡点，因此具有不可违悖的时代精神。

这关注点的寻求轨迹，也就是作者的劳动过程。贴近读者和生活，注重在题材和风格总体把握上的“百姓化”，就成为《众生丛书》的宗旨。

《众生》写百姓已经在关心的事；写百姓希望知道的事；写能够引起百姓兴趣的事。这里的“百姓”，是一个与“众生”贴近的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最广大的阅读人群。

“百姓化”这一宗旨，使《众生》抛弃居高临下的说教，只对运动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做理性剖析，《众生》里没有哗众取宠故作耸人听闻的噱头，只有客观生动真实的世态展示。

《众生》来源于生活。粗糙的生活素材经过作者的创作而升华为纪实作品，因此在审美范畴中又与生活有一定距离，正如哲人所说：最完美的欣赏是在距离中完成的。

这一距离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平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

《众生》的生命力就在于引起众生的共鸣，这是我们的希望。

《众生》的作者们其职业是记者，其社会职能是作家，记者的冷静观察客观再现与作家的热情洋溢主观表现的职业风格融汇在一起，便形成了新闻与文学的最佳表达因素。这种表达因素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用不同的特点表现多种多样的社会题材，描摹丰富多采的社会图景，勾勒千姿百态的社会众生相，剖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症结，鞭挞丑恶愚昧的社会现象，《众生》紧扣着“百姓化”这一宗旨，便有了较强的可读性。

《众生》首辑推出了九本书。

王崇理的《中国体坛热点写真》，围绕当前体坛的热点问题写了马家军的大起大落和再度崛起；甲A联赛和中国足球职业化；中国女排这道难题谁来解决？复仇的女人小山智丽；体育产业的前景和李宁的八个公司……那些体育界鲜为人知的曲折和故事，同比赛场上的辉煌记录一样，会使热爱关注体育的人们为之激动不已。

郝在今的《生存大战》，以犀利而不失诙谐的笔锋展示了当今社会人人都身不由己被卷入的形形色色的激烈竞争。

艳齐的《白手打天下》，以那些不甘于命运摆布、不愿苟活、不安于现状者为摹写对象，不仅揭示了他们奋争的痛苦，人生起落的无常，而且披露了他们的起家路数和成势门道。对于决意成就一番事业者，本书会给你启示和力量。

毛磊的《家有祸福》，以严肃的态度剖析试婚热、婚外恋、独身主义、异国婚姻、家庭暴力、性骚扰，以及同性恋者的隐秘世界……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这一切对我们昔日的那个家究竟是祸还是福？

沈英甲的《采访死亡手记》是对阴阳交界之处的采访报告。尸体解剖室、太平间、火葬场……，这些颇有神秘色彩的场所虽然为人们所忌讳，然而却也是大家无可避免都要面对的地方。相信读者会为里面披露的事实所震动。

曹志前的《汽车狂飙》，抓住汽车进入家庭这一百姓乐道的热点话题反映了汽车文明和汽车文化给社会与人带来的狂飙般的冲击和震荡。

程濛欣的《采访女人》，自然采访的都是女人，她们或有坎坷的经历，或有尴尬的婚姻，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们一生平凡，然而却并不平庸……你会从她们的故事中看到某种可贵的东

西，或许那会使你对人生有新的理解。

连继民的《黑魂》，呼唤廉洁，铲除邪恶，这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邪恶，必有铲除邪恶的勇士，书中所记录的便是当前针对腐败邪恶展开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刘一达的《都市新闻眼》，以记者敏锐的双眼，捕捉着动态的社会现象、人物、事件，于是那扑朔迷离的宝石市场，困境中的老药铺，都市拾荒部落，寻找出路的下岗工人，外来妹的婚恋，以及社区问题……便被披露在世人面前。

九本书虽题材与风格各异，但也有共同的方面，概括起来有三点。

首先是亲历性。作者发挥记者以采访见长的优势，获取大量独家的第一手材料。为了这套《众生丛书》，作者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

其次是资料性。任何作者都没有三头六臂，不能穷尽某一领域的采访课题。因此采用翔实的权威性的背景资料，来补充对新闻事实的描绘，成为《众生丛书》的一个特点。

第三是在写作手法上以通俗笔触来表现严肃的社会内容，这样不仅使作品有了新鲜的现实感，更使文字有淋漓酣畅的阅读快感和较浓郁的文学色彩，使之更贴近“众生”。

在当今的图书市场上，纪实类书籍在被读者看好的同时，也是良莠混杂的。《众生》也许尚未完全做到尽如人意，但它毕竟融汇了作者真诚的劳动。

我们期待着众生对《众生》的教正。

曹志前

1995年12月1日

前言

我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生的孩子碰巧又都是女儿；我还在女子大学读过书，在女子中学教过课……照说，应该很了解女性了。其实不然。

自小，受了男女平等的家教影响，就觉得女孩应该和男孩一样。后来，经过那“无性年代”的熏陶和异化，更觉得，女人，就是和男人一样的——如果讲性别差异，讲女性特点，似乎就贬低了女人的独立和尊严；如果流露出爱美之心，表现出对家庭的眷恋，对丈夫和儿女的柔情，对家务的兴趣……似乎就是不健康的情调，至少是没多大出息。直到新时期，进了妇女杂志社，面对着采访妇女的任务，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女性的认识有着怎样的误区，也才反思自己在扮演女性的多重角色上是何等的不称职。但这时，父母已经去世，丈夫已经年老，孩子已经成人，我再怎么努力，也补不上这永远无法弥补的课程了——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

随着自己由异化而复归，我对女性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了。特别是离休以后，我广交女性朋友，越来越觉得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可爱，她们的人生更有滋有味，更丰富多彩。这，也许是由于她们的本性就更敏感，更细腻；也许是由于她们因袭的重担和承受的赘累，更复杂，更深沉；也许是由于她们的经历和感受、幸福和痛苦、成功和失败……更能引起我的共鸣，也更

能折射出我们的社会和时代，给人留下更多的回味与思考。

于是，我又采访了。

我走向一个又一个姐妹们，摊开我的笔记本。没有预定的主题，没有采访的提纲，只是静静地倾听她们敞开心扉，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好像陪伴着她们重走了一遍人生之路。尽管她们有的功成名就，有的平平凡凡；有的时来运转，有的一生惨淡；有的才貌双全，有的不大起眼……但她们都有坎坷，也都有顺畅；都有悲伤，也都有欢乐；都有内心的阴霾，更都有精神的闪光。她们对人生的理解，是实实在在的。她们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是真实具体的。她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深深地触动着、吸引着、撞击着我。

我喜欢太阳的光辉，更喜欢繁星的灿烂。所以这里所写的，大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我是怀着采撷星光的心情，去采访她们的。我的采访，往往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有的甚至跨越了好几年。我进入了她们的生活，成了她们的朋友，终使我有可能原原本本地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女性，写出她们真实的人生、人格和人性，呈献给亲爱的读者。希望您，能从中想到点什么……

目 录

1	/	前 言
1	/	第一章 平凡与平庸的界限
33	/	第二章 生命与美学的交响
60	/	第三章 迟到的追光
87	/	第四章 多舛的寻求
118	/	第五章 混浊的和明亮的
149	/	第六章 苦涩的和甘甜的
174	/	第七章 好有好报
197	/	第八章 “阿弥陀佛!”
268	/	后 记

她曾为“两航”起义做过贡献，如今，八十岁了，还在经管着两所大学50万美元的奖学金。一辈子，她认为该做的事，就去做，做了很多很多；认为不对的，就反对，不管面对的是什么事，什么人……

第一章 平凡与平庸的界限

张滢华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1939年的毕业生，我的老前辈。我们都是女大北京校友会的理事，但只是在开会时才见见面。

她给我的印象是：穿着特别朴素，手里常捏着个尼龙绸的小包。别人说话时，她总是侧耳细听，有时还用手卷起耳朵，大概是听力不佳；一插话则往往走题。她喜欢讲过去的事，说起来就没完，而且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等等都能讲得十分清楚，每个细节仿佛都镌刻在脑子里。人们夸她记忆力好，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像孩子似的。其实，这称赞里有时含有善良的揶揄和打断其谈兴的意愿，她却听不出来。八十岁的人，仍保持着儿童的纯真。

一次理事会上，谈到为继承母校传统而筹款建设金陵女子学院的事，她毫不犹豫地自报了1000元。大家都有点吃惊，因为知道她的丈夫——当年民航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何凤元，已经去世多年了，她自己也于1974年从北京六十六中退休，到80年代中期才改为离休待遇，能有多少收入？……

“别太勉强了！不用这么多……”副理事长说。

“没关系，我不勉强，我应该为母校多做些贡献！”

她的话，使我想起了她为《金陵女儿》一书撰写的文章，其中饱含着的对母校的深情和对师长的怀念。我很想进一步了解她。

按照她留给我的地址，我来到一个大院内装有铁栅门的民航宿舍，在一排很普通楼房里，找到了她的家。

一套三居室的旧单元房，光线不够充足，陈设也很简朴，家具不配套，东西有些零乱。引人注意的，是阳台上 and 屋里向阳处摆着的各式各样绿色植物，虽不像是精心照料的，却能显出主人对大自然的爱。门上和墙上挂着的地图和历史年表，道出了主人的志趣和爱好。而厨房菜案旁洗得干干净净的塑料小口袋，洗手间里马桶圈断裂处粘上的明胶条……则向我诉说着主人的节俭。

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想到她为母校的慷慨解囊，我心中交织着敬意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让我坐定在沙发里，她给我沏了一杯茶，问我：“这里还好找吧？”

我说：“还好。我进了大院，先打听十四楼，没人知道；可一说民航宿舍，谁都知道。”“是这样的。”她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当年起义的人员都住在这里吗？”我问。

“不是。这是后来分给我的，凤元没在这里住过。”她有些感慨。

我的目光落在案头一张他们夫妇俩的照片上，心中卷起了五十年前的历史风云……

“两航起义可是当年震惊世界的大事。”我说，“还记得1949年底我路过香港时，那正是当地人谈论的热门话题。凤元同志是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你当时一定也做了不少工作吧？”

“是啊，我帮助他干过一些事情……”她说着，沉入了回忆。

那是1949年11月9日，“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两千多名员工，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胁迫，毅然决定不去台湾，在香港宣布起义。当日，两位总经理就率领12架飞机，飞回解放了的北方。留港的起义员工则通过英勇的斗争，成功地保护了公司的全部财产，包括上亿美元的设备和器材。

这一伟大的爱国壮举，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党派往香港的地下工作同志具体组织下完成的。何凤元，身为“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在起义酝酿过程中，曾受命做刘敬宜总经理的工作，帮助他打消顾虑，动员他率部起义。

凤元同志原是一二九运动时期清华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在战乱中，因工作的调动和突发的事变，失去了党的关系，但仍一直为党所信赖，为党做工作。当时，面对党交给的这一任务，他考虑到自己年仅三十六岁，职务又在刘敬宜之下，能否说服他，没有把握。于是，便和在港的清华老同学乔冠华商量，建议由自己牵线，让乔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身份去做刘的工作，并商定在英商新开的一家豪华旅店安排他们的秘密会见。

“这是在起义前几个月很有戏剧性的一幕。他们把去旅店安排房间的任务交给了我。”张滢华大姐有点兴奋地讲起了这段故事——

为了避开特务分子的注意，我乔装打扮成一个从台北来的阔太太，拎了个漂亮的提包来到旅店，租了三层楼边隅的一个单间。登记时用的是“中航”已故驾驶员闰宝升夫人的名字，理由是要去广州，途经香港采购些东西。我冒名顶替的这位夫人，当时正住在我家里。

办好手续，到房间里放下提包，我说要外出采购，让服务员锁好房门。我就赶快回家了。

中午，凤元回家吃饭，我向他做了交代。下午4点，我提上两大包洋货返回旅店，很像采购回来的样子。不久，凤元驾车接来乔冠华，嘱我先陪一会儿，他再去机场迎接从广州来的刘敬宜。我按照他的要求，为了避免被刘碰见引起怀疑，在5点半他们可能回旅店之前，就离开了。

晚上凤元回家告诉我，会见的情况不错，看来这次说服动员工作有了个好的开端。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旅店结了账，然后拎着我的提包和洋货走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想到自己第一次完成了一项秘密工作任务，心里非常高兴。

在这段时间，凤元还让我做刘敬宜夫人和其他高级职员夫人的工作。我就有意和她们接近，跟她们谈心，还把我在上海的亲友解放后的来信拿给她们看，帮助她们消除对共产党的疑虑，培养对工农大众的感情。一次，香港一些进步文艺团体为募捐举行义演，演的是话剧《白毛女》，金女大同班同学沈谱为他们推销戏票，我就买了几十张，请“中航”的太太们去看。看戏时，刘太太坐在我旁边，当看到黄世仁逼债一场时，她擦着眼泪说：“喜儿多可怜，还没我女儿大呢……”

当时，能争取这些太太们“不拉后腿”，对于起义成功也是很重要的。

临近起义时，凤元把一位同志带到家里来，告诉我，他叫吕明，是做秘密工作的，因为在他住的大饭店工作不方便，以后白天就在咱们家写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吕明同志身负重任，是周总理从华东局吴克坚同志那里，选派来港策划两航起义的。

那一段，吕明差不多每天上午都来，我们的卧室就成了他的办公室。为了不使女佣怀疑，我和他以表兄弟相称，说他是从上海来香港做生意的。孩子们也都很自然地叫他“舅舅”。我知道他是杭州人，便烧些南味的菜，让他吃得满意。有时他下午不走，那就说明晚上要有人来家里开会，我就赶快做些点心，准备招待他们。开会时，我就到客厅外的阳台上，给他们站岗放哨。

其实，不开会的夜晚，我也经常要在阳台上站很长时间，为的是等凤元回来——我不放心他的安全。因为当时有人放出风来，说何凤元靠不住，要把他带到台北去……

趁她停顿的机会，我插了一句：“你做了这么多工作，当然该享受离休待遇啦！”

“还不止这些呢。”她笑笑。

那时，她还是个“跑交通”的。为了反对将“中航”迁往台北，并抗议英国人以强占厂房相逼迫，何凤元当时写了不少文章，向港府施加压力。这些稿件，全是由张大姐送往香港新华分社，亲手交给乔冠华同志用新华社名义发稿的。

宣布起义后，国民党方面控告“两航”，还派人抢夺公司财产。起义人员则拼力保护财产，抢运器材。斗争形势十分紧张，与国内的联系需要加强。为了安全，通讯点就设在何凤元家中，通讯任务就落在张大姐身上。每有紧急电讯，她都是一面突击译出电文，一面打电话让凤元派车来取，从未误过事。

起义后一个多月，中央人民政府分三次汇来港币600万元，都是汇到张大姐名下的。她一次次冒着被钉梢的危险，及时去银行取出钱来，交给“两航”留港领导小组，保证了起义员工的生活和抢运器材回国、跟国民党打官司等各项费用。

除了这些直接为民航起义服务的工作外，她当时还为党做过一些其他工作。例如，1949年春天，国民党元老居正夫妇从台湾来到香港。由于居老的女儿是张滢华金女大的同学和好友，居老还曾在重庆为她主持过婚礼，她就利用这种关系，按照党的华南局社会部的安排，去动员他们回归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并准备陪送他们到北平。居老基本上答应了，只是表示回来后不当官，要为民。可惜，由于居夫人担心隔断他们和全在海外的子女的联系，最终没有成行……

“还有一件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接受党的委托，掩护过一位从延安路过香港去上海的机要译电员——”

这还要从头说起。

抗战胜利后，我从四川回到上海，住在“中航”宿舍里。不久，由当年成都学生运动中一位战友介绍，我与我们党华东局社会部的“老吴”取得了联系。他知道我是抗日学运的积极分子，就让我帮他收发书信、文件等。当时我虽然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但知道它们都是重要的机密，因而十分精心。大概老吴对我的工作还比较满意，所以在1946年我们全家随凤元搬到香港后，他仍把发来香港的文件、书信等寄给我传递。我有时还把地下党在香港办的《群众》、《战斗》等刊物裹在毛线或衣料里，托可靠的人带往上海交给他。

1948年11月的一天，我接到老吴密信，要我照顾一个小姑娘由港去沪，保证安全。当时凤元去美国开会了，我只能独自来完成这一秘密使命。

我按照约定的地址，找到了这位“小姑娘”。一开始，她没有作自我介绍，也不说什么话。等我给她看了老吴的信，问她：“需要我做什么？”她才说：“请替我买张飞机票，还要给我起个

名字。”接着给了我买票的钱，并要求我送她上飞机，说她带着一块豆腐干大小的重要东西，一定要保证能安全带走。我说，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怎样能躲过盘查，顺利地出香港关，进上海关，我一定尽力设法。但我提醒她要梳妆打扮一番，并教了她。

我给她起了个“方惠珍”的假名，买到了机票。在给她送票时，看到她已如我所希望的，烫了发，穿上了呢旗袍、高跟鞋和玻璃丝袜，把从西北高原带来的“土气”去掉了。新买的皮箱里，还放了些衣料、毛线、奶粉之类。她告诉我，那块“豆腐干”已经藏好了。我没再问什么，只跟她约定，登机那天在九龙“中航”办事处碰头。

那天我们如约会合。她打扮得不错，只是随身又多了一个旅行包和一卷用旧报纸裹着的毛毯。她说包里装的是恐难过关的要紧东西，并再三强调“非常重要”。我想了一下，就让她把包交给我，毛毯则丢到墙角无人处。然后，我带着她走到候机的旅客当中，找到了一位由港返沪的“中航”总公司的熟人，请他关照“小姑娘”。我说：“这是我表妹，我托她带了些衣料和毛线给上海的亲友，进关时请帮她打个招呼。”于是，就让他们随着人流出关登机，我则提着那“非常重要”的旅行包，杖持自己是“中航”的“官太太”，进入机场，直奔飞机，悄悄地登了上去，找到“小姑娘”的座位，放下包，赶紧下来了。

这是我在港几年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违反港英政府的机场制度擅自登机，还“走私”了一个旅行包！当时真有些提心吊胆，生怕被发现，惹出麻烦，影响任务的完成。幸好一切顺利。当天晚上，华南社会部的秘密电台就播发了“方惠珍平安抵沪”的消息，并立即用电话通知了我。

1951年我随凤元回京途径上海时，才从华东局社会部同志